



马友友的天方夜弹

舒羽

一个人的阅历大约是有重量的,我想。这重量让人变得低沉,所以,年纪大了,走路就慢了。我小时候喜欢听古筝,总觉得叮咚作响的丝弦里拧得出水来,鬼灵鬼灵的,长大了却更爱古琴的含蓄与分寸。听琴就像听一个老者说话,一句顶得上妄人的一席。然而低沉并不表示没有喜悦,压抑的表达往往最有力量。因此,虽不到中年,我听大提琴却能听出中年的心情来。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猜出大人的心思,偶然看见母亲哭,我也不怎么难过,反倒觉得人应当懂得克制。女人可以流泪,但不可以哭,我就这样没心没肺地以为。

大提琴是人。他的身体,他的嗓音。有夙慧的琴师朝他吹一口气,他就活了,就跟你说话,谈心,有时还很执拗,要与你争执,惹得琴师癫狂万状,抱着他摇啊、拉啊、捶啊、打啊,爱恨交织的,好像有多少谈不拢又放不下的话题似的。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比较理想的晚年生活定是要请大提琴先生相伴。大提琴让我想到噼啪作响的炉火、古色斑斓的披肩、半旧不新的杯子和屋外流逝的时间。大提琴的声音是从木纹中走来的,像一种讲述,像旁白,温厚,中肯,无情,但公道。可他言说的一切都在屋外,在夜晚流动的空气中,此时,屋内的我们却是暂得安生于流逝之外的小小存在。就着明亮的炉

火,我们感到过去的一切都可以挽回,也还来得及细细体会。该悔恨的在此刻悔恨,该感激的在此时感激。想到这一分宁静,我甚至希望炉火旁的晚年时光快点到来。

为什么要听马友友?很简单,因为他是华人音乐家。因为血液的关系,我相信,曾经感动过他的事物也一定可以感动我。三月六日晚八时,杭州大剧院,马友友来了,与他“丝绸之路乐队”的伙伴们一道出场。一个中年男子,普普通通,欢欢喜喜,走出来,坐下去。我很喜欢这样的出场方式。很多所谓的人物之所以需要借助激昂的音乐、惊愕的聚光灯和主持人受宠若惊又受惊若宠的接引,皆因不自信。

然而,马友友大约是铁了心希望杭州观众能够忘了他吧?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这位大师竟心安理得地混迹在乐队中,就像当年的卓别林挤在“模仿卓别林比赛”的人群中找乐子一样。大家合奏的时候他也一溜着出来了,小组重奏的时候又不见了,从头到尾愣是没有等到他哪怕一个华彩片段。至于独奏,那是完全轮不到的。大约马友友心里也明白乐迷对他的期待,一度终于高抬贵臀,把椅子挪到了台前,结果却是为吹笙人吴彤演唱的哈萨克民歌《燕子》做伴奏,而且音符给的极为简约,能断开的绝不粘连,像是惜墨如金,又像是画龙点

睛：远远地进三步，凑过去，描一笔，逗一点，又遥遥地退三步，袖手旁观起来。多谦虚，多审慎，真有点微服私访的味道。

这多少有损于杭州观众对海报上“马友友三十年来一次”的信任，也由于台上的这位大提琴手使用了马友友先生的名号，而大大伤了乐迷的心。此等失望的体验，就好像人们见到周星驰，发现他的举止一点都不好玩，讲话一点都不好笑，正常人一个样！所以，那晚回家后会顺手写下几句俏皮话，说老马不会拉琴的可能性很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国外的音乐经纪公司，旗下的一位音乐家曾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流行钢琴王子，蓝色的眼睛，深情的乐句。可是作为工作人员，我们被直接告知，该钢琴家早已不再弹琴，其表演皆为录音与手形的协作配合。有这样的故事打底子，我的抗击能力强悍了许多，再加上疯传马友友日常事务繁忙，下得乔布斯家的厨房，上得奥巴马就职演说的厅堂……我也就释然了。应该说，作为一名普通乐手，马友友当晚的表现无可指摘，因为整支“丝绸之路乐队”的能量大得简直可怕，直让人想把每一个音符都小心地收藏起来，好回去慢慢疗伤。所以，第二天有朋友说弄到了上海站的门票，我便不打二话，开了车就走了。再说，心里也着实放不下那印度鼓手、伊朗琴手、西班牙女风笛手，以及那几个形神各异、吊儿郎当的帮闲乐手。

不去还好，这一去使我原本就颇感不快的心情变得愈加不快！想起了一部青春剧，说一位女孩移情别恋了，男孩因为太过绝望沉默不语了好些日子，大家都以为他失声了，怪吓人的，可是突然有一天他指着女孩哭喊道：“你这个骗子！”这个片子也就这样达到了一种悲剧到深刻的喜剧感。听完上海站的音乐会，我原本只是骂骂咧咧的几句微词瞬间没了，只想手指着马友友，恨恨地说：“你这个骗子！”

是啊，连着两天，马友友伤了我的心两次：一次是因为失望，一次是因为绝望。

与在杭州的低调相比，马友友这回可真叫活跃：几乎每个曲目都掺合，而且华彩不断，时

而是繁华胜事、凡庸现实的再现，时而是美物写生、勾勒微妙的刻画，时而是情思萦逗、缠绵固结的钩沉，时而是纯净圆熟、浑朴真率的吐露。一切思想、色彩与图形，在他的挥霍与指示下掰开又揉碎，让人意悵神动。飞扬的琴弓为所欲为，这才是挥舞魔杖的马友友！

掌声哗啦啦哗啦啦激起一层层水雾让我眼睛都睁不开简直就不会再有放晴的时候……

中场休息后再进场，朋友指我看前几排正落座的谭盾，又是一位大师。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上海，有张爱玲的上海。如果学张爱玲讲几句刻薄话，Yo-YoMa对上海的宽绰与对杭州的怪吝都维持在同样高的水平上，敢情真把杭州当作上海的后花园了？

两天下来，由于情感上的复杂而导致我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为敌复仇式的紊乱。哎，算了算了，不纠结了吧。反正我杭州上海包了个圆，无可遗憾的了。还是回味一番马友友与伊朗弓形鲁特琴师贾赫尔合作的《嘎西达》，谈谈这对旅人弥留在时空中的对话吧。

无论在杭州在上海，马友友在演奏前总向大家介绍贾赫尔和他手中的乐器，他对贾赫尔恭敬有加，称之为自己的老师，还说鲁特琴是大提琴的祖宗，因为诞生的时间比大提琴早很多。从十二世纪有文献记载以来，鲁特琴的确一直以谦和的、民间的、宗教的形象出现，经常演绎简单、温暖的伊斯兰音乐，演奏的时候可以摆在膝上，也可以放在地上。贾赫尔的习惯显然是放在地上，格外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流浪感。《嘎西达》即兴的成分很浓，是一首二重奏，但实际上是“幻影三重奏”。乌兹别克的作曲家杨诺夫专门为大提琴和波斯音乐创作了它，灵感来自贾赫尔的一盒音乐带。作曲家说：“当我开始在乐谱上研究这个录音盒作品时，我决定将贾赫尔的主题融入乐谱本身录音的部分。这个主意不是将录音用作大提琴·卡曼奇二重奏的背景，而是作为三重奏中的另一位成员——幻影三重。”

舞台上，贾赫尔和马友友各执一琴，分坐两端，像一对手拉手拉大锯的锯匠，又像是两个棋枰上手谈的弈士。一个声音来自空中，是



另一个藏匿在录音带中贾赫尔发出的,大提琴和鲁特琴在这个声音中恣情穿梭、随意进出,像秘鲁诗人聂鲁达长诗《马楚·比楚之颠》中的第一句:“从空间到空间,好像在一张空洞的网里。”

席地而坐的贾赫尔始终处于游弋状态,神思遨游犹如风舞落叶,但是片云可以致雨,他的飘忽是可供寻绎的线条,常常引得风流云动,似智者的占卜术。大提琴呢?虽不乏放纵驰骋的表达,但看得出在努力保持着良风美俗,远远地迎过来,动情地说上一席工致华缛的心里话,之后侍立一侧,恭听下文。大多数的时候鲁特琴自顾自织网,一副习焉不察、熟而相忘的样子,于是大提琴只好退避一旁,侧身走自己的小道。但心思缜密、沉迷于针黹缝补的鲁特琴有时也会毫无征兆地突然扰攘起来,横挑对手。面对强邻的兴兵犯阙,大提琴起先是有礼有节的答复,惹急了,便挥舞琴弓如剑走偏锋,浓墨重彩地抢白一番,甚而冲过去扭打作一处,难分难解。雅健奢靡的大提琴再也顾不上原本英国水彩画家般的绅士风度了。这般激烈的挑衅与交锋让人坐立不安,但乐曲终于在各臻极致而又无所黏滞中结束了。

大提琴与鲁特琴,马友友与贾赫尔,一对仇敌,一对兄弟!

九岁开始拉琴,囊获过十五次格莱美大奖的马友友,是什么时候走向自然、走向民间的?我想上海大剧院的观众席中一定也坐着翟小松吧。他在《音乐笔记》里提到过一件事,说马友友在非洲原野上看到一位黑人兄弟,仅仅用一根挂在树上的钢丝就奏出了一段极动人而又不可再现的音乐,面对他,面对这片原始与广袤,学院派的音乐大师马友友只能无奈而恭顺地拉上一曲巴赫。这是不是一个刺激?刺激他找到了贾赫尔,这位不识五线谱的伊朗的老琴师?也许吧,有时放下所得是冲出自身局限的唯一方法。

在对音乐的描绘中,我也深感用文字去巩固音乐犹如用鞭子去抽打空气,纯属狂妄者的蠢举,最终不过是一场扑捉萤火虫的徒然而无效的游戏,因为抓住了一只,惊飞了所有;抓住的越多,飞走的越多。音乐本身已包含了太多

叹息。可就是有许多人在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这项游戏,以艺术的名义捕捉艺术的本质,这种能力也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文学、美术、雕塑、音乐,艺术彼此寻找,道出的只能是作为未能道出部分的补充。

想起头一天晚上,老贾赫尔坐在舞台中间抬起的一块平台上,乐手们围坐在他身旁,与他共同演绎了一首《寂静之城》。十几分钟的时间整个失陷于不可思议的带有一丝温甜的苦难中。伊朗,战云密布的伊朗,阿巴斯的忧伤。我满以为,从贾赫尔摇摆的臂弯与勾连的指间溢出的琴声,必是一片深重的苦海。却未料,从引子开始,一个个乐句像粉红的天空一般,慢慢地铺陈,缓缓地降临,隐隐地似有祝祷的歌声从某处渗出,是那么平静的陈述,神圣的怀念,以至于未及听得真切,又被一双看不见的手小心翼翼地捂了回去。随后弦乐、管乐、打击乐等更多乐音渐次参与了进来,小心谨慎,犹如声声殷勤的问候。音符们亦步亦趋地行走着,像波斯挂毯上衣袂飘飘的人,相互簇拥着,叠加,抚摸,拥抱,回旋,上升。

贾赫尔的悲伤是粉红色的悲伤,是温情、高贵而节制的悲伤。而印度音乐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彩色斑斓的,犹如跳舞的非洲。鼓手珊迪普·达斯在我眼中是一位油画家,富谐趣而盛彩藻。他向着空气随意涂抹色彩的本领,想必能为许多职业画家带去启发性的悟见。而且他擅用湿笔,色彩鲜活、跳跃,如孩子们穿着糖果色的节日盛装。不得不叹服,音乐家的手指是他们原本就细于常人的神经末梢的外在表露,机智、警觉,敏感得像盲人的耳朵。

达斯的鼓叫塔布拉,是一大一小并排的两只,它们周身被紧紧包裹着,只露出小小一个直径的鼓面,特殊的构造使它能发出摄人心魄的音响效果。演奏者会一边用手指击打,一边又急于将声音摀下去,把声音扑灭,像极了一个技术高超的纵火手,先是射出子弹,然后一个反手,又迅疾地接住了自己射出的弹头。达斯便是这样的神枪手。他能让声音形成一个又一个黑洞,很快,听者的心就随之沦陷了,变成了一块块沉坠的石头,不自觉地滑入了一个个

浑圆的深渊中，迷幻，灭顶，窒息。欣赏这种因对恐惧的执迷而产生的美感，近乎欣赏在地狱的风中飘荡的保罗与弗朗西斯卡的爱情，那么痴迷，无助，又那么凛然，勇敢。但矮个子的达斯看上去是如此忠厚老实，一点都不像一个为非作歹的人。

至于加利西亚风笛手，那位性格劲爆的西班牙女郎，我就不敢打包票了。除了诱惑，她什么都不会。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娜·派朵，名字像她染成绿色的头发一样，太长了，我只想再说一遍。杭州站演出的第一个曲目叫《卡隆特》，讲述的是希腊神话故事中摆渡人卡隆特将亡灵运过冥河的故事。这女人一出场我就知道，卡隆特完了。那天她穿着一身长长的红色连衣裙，那么鲜，那么艳，是斗牛士手中的红布的那一种红。她怀抱一只风笛，像怀揣着一只乳香四溢的小马驹，就着马驹她直腰一吹，身体就向后倾倒了下去，倒得那么低，好像等着谁去扶。一个高亢到极点又扭曲到极点的声音就这样被她吹了出来，这是一个放浪到妖魔化了的的声音，凌空扭动腰肢，空气中编织着多少不安分的绮思？再配上西班牙女郎特有的身段，鄙夷的眼神，探戈的步子，幽灵的气息，哪怕是一只老鼠也一定会被这只猫吸引的。真真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态。尼德兰谚语中说，像这样的红衣悍妇，就算独闯地狱也不会受到伤害。这一次，我信了。同样作为一个女人，虽然我的傲慢让我对此不屑一顾，但又不得不同意：男人若是对这样的女人犯下了罪，倒也并非不值得同情。而上海站的表演，由于曲目的关系，她的凌乱不堪的教养显然收敛了不少，但也让她显得不那么酣畅淋漓了。

另一个对我产生极大诱惑的，是日本的尺八演奏家梅崎康次郎。他抽搐着身体，眼看着把一根笔直的竹管也吹成了弯曲的形状，听的人心里一酸，看哪儿都是凄怆的异乡，而且欲归无路，欲归无期。尺八是唐朝时候传入日本的，卞之琳先生的《尺八》写道：

像候鸟衔来了异方的种子，
三桅船载来了一枝尺八，
从夕阳里，从海西头。

长安丸载来的海西客
夜半听楼下醉汉的尺八，
想一个孤馆寄居的番客
听了雁声，动了乡愁，
得了慰藉于邻家的尺八，
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
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

这位梅崎康次郎的祖先，恐怕就是一千三百年前寄居在长安孤馆里的那个遣唐使吧？跟卞先生一样，我也觉得单纯的尺八像一条钥匙，能够为我无意地，“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

上海站仍然保留了杭州演奏过的《诞生》这个鼓乐节目，我不禁莫名其妙地油生一种自豪感。细想想，这四种鼓没有一样是中国的，四位鼓手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可高兴的？但我就是高兴，而且的确自豪。四个人，除了那印度人达斯是好得不用说了，另外三个也是个都称心如意。尤其是最边上一个瘦高个打排鼓的，穿着一身笔挺的衬衫西裤，让我喜欢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想，假如是我的儿子就好了！回头一想，又一笑，他未必就比我小呢。还有一位老兄，情难自禁时竟站起来拍打全身，拍胸脯拍屁股拍大腿，把身体拍成一具乐器，真真匪夷所思。

四个鼓手都好得无可挑剔，表面看似油滑，却相互默契极了，一个灵子，扔过去，荡过来，引出观众阵阵讶异与错愕。而他们之间的那个游戏，那个灵子，只会故意悬置，绝对不会出现失了手接不住落了空的情况。这“丝绸之路”的班子，就像巴萨队的拉马西亚青训营出来的发小们，梅西，哈维，伊涅斯塔，一群小矮人在跑动，灵犀一点，灵光一闪，一传，一切，你还没缓过神来，球进了！

一个个乐手都要这样说过去，实在显得我背晦了，杭州话讲“嘎背滴”，尤其怕被伊拉上海人看轻了，说我们杭州人没见过世面。但是忍住不说，却也不好，尤其不能亏待了咱们杭州的琵琶女吴蛮。同行间总是缺少神秘感，所谓熟人面前无英雄。吴蛮虽与我读过同一所艺校，学的也都是民乐，熟倒是不熟的，再说我也久不操练了。我最喜欢她弹到高兴的时候放开



两只手敲打琴面的机灵样儿，像一只悬空翅的小麻雀，又像骑自行车时的双放手，好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心情。

吹笙人吴彤，要不是上海站结束后加演的那一段，我会停留在杭州站的印象上，还以为他唱得比吹得还要好呢。是“小楼吹彻玉笙寒”的笙么？是“相对坐调笙”的笙么？怎么可能摇滚？能，无限的可能。他和印度鼓手达斯，一个摇唇鼓舌地吹，一个指手画脚地打，吹吹，打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将一场音乐会搅到最后，搅得我彻底不得安生！

马友友说，自己很可怜，一个中国人，却像犹太人一样流浪世界。但流浪的人有福了。流浪的音乐有福了。这些流浪的笙、琵琶、尺八、塔布拉鼓、鲁特琴、风笛、小提琴和大提琴，在一整张欧亚地图上撒野。与其说他们是音乐家，不如说是浪迹天涯的艺人。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夜晚都是一千零一夜。他们把灵魂藏进弦管里，像把迷香藏在灵魂中，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堡，团伙作案，骗取国王的珠宝，掳走公主的爱情。

附诗：

一千零一夜

——记2011年3月6日《丝绸之路》杭州音乐会

我迷上那个印度鼓手达斯了，
你看见了吗，他的双手沾满了颜色？

——我一直在注意的是深渊。
他掘出一个又一个浑圆、向下的黑夜，
我多想滑下去，滑下去，把自己淹死。

看看那沉默的伊朗人吧，
低着头多忧郁！他摆布着鲁特琴，
仿佛命运在摆布着他。

——你是说那个席地而坐的贾赫尔吗？
他失去了上帝指向的隐喻之地。
为了寻找，他把自己变成了盲人。

天哪，我不能忍受那竹管的哭泣！
它吹破了夜，故乡变得遥不可及。

——那叫尺八。
听说管子深处隐居着一位唐人，
披头散发，落拓不羁，是诗仙也是酒狂。

哦他叫什么，最边上，击大鼓的高个儿，
风流倜傥。约瑟？马克？还是肖恩？
瞧他噱头噱脑的样子，简直像个坏人！

——据不可靠消息，他来自爱琴海，
最擅长兴风作浪，专门制造别致的战争：
黑珍珠、蓝宝石，豪夺、嫉妒与恐惧。

你猜那女人的亡灵能迷住卡隆特吗？
看来她是个急性子的泼辣货。有了她，
地狱也别想安宁！

——西班牙女人总是会有办法的。
别忘了她会吹苏格兰风笛，冥河摆渡人
有多久没有听到过这样如火的歌子了！

大提琴是命运的旁白，尽说着
无情的公道话；小提琴是快乐的单身汉，
只负责带来风景。我欢喜《燕子》，它歌唱爱情！

——那是一支唱给过去的歌，
谁有过去就唱给谁听。至于爱情，
爱情就是过去认为是那样，
现在认为是这样的东西啊！

真是神奇的一千零一夜！
不管怎么说，Yo-Yo Ma可真让人失望，
可怜见儿的，一支像样的曲子都没留给杭州。
你听着，我这里有一个被证实的谣言：
老马不会拉琴的可能性很大！

——你相信神话可以被创造吗？
我想不好，所以无法回答。